

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二种

# 裘开明图书馆学

## 论文选集

● 程焕文 编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Studies, No. 2

# SELECTED WORKS OF ALFRED K'AIMING CH'IU IN LIBRARY SCIENCE

Edited by Cheng Huanwe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二种

裘开明图书馆学

论文选集

● 程焕文 编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Studies, No. 2

SELECTED WORKS OF  
ALFRED  
K'AIMING CH'IU  
IN LIBRARY SCIENCE

Edited by Cheng Huanwen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裘开明图书馆学论文选集 / 程焕文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9

(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

ISBN 7-5633-4192-7

I. 裘… II. 程… III. 图书馆学—文集  
IV. G25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236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29 字数: 473 千字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 ~ 600 定价: 12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谨以此书

纪念伟大的华美图书馆学家裘开明博士  
纪念哈佛燕京学社和哈佛燕京图书馆成立75周年

This Selected Works Is Dedicated to

*The Great Chinese American Librarian Dr. Alfred K'aiming Ch'iu*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Sev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nd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袁开明 (Alfred K'aiming Ch'iu)

March 11, 1898—November 13, 1977

# 前言

P R E F A C E

这部《裘开明图书馆学论文选集》的编辑起于大约三年前笔者与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先生 (James K. M. Cheng, Librarian of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的约定。2000 年 6 月, 郑炯文先生应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邀请到广州来访问, 在那次访问的日程安排中, 郑炯文先生将参观中山大学图书馆和与笔者会谈列为到广州访问的第一项日程。因为邀请单位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笔者只是在郑炯文先生到达广州的前几天才获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通知。起初, 笔者并不了解郑炯文先生到中山大学访问的目的, 更不明白郑炯文先生为什么要把访问中山大学和与笔者会谈列为他到广州访问的第一项日程。6 月 2 日, 郑炯文先生如期到中山大学访问, 上午参观校图书馆, 了解中大图书馆的馆藏以及有关中文图书的采购事宜, 下午在中山大学小礼堂为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馆员和信息管理系的师生做学术报告, 题目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回顾与展望》。忙了整整一天, 直到晚宴时, 郑炯文先生才正式向笔者谈起他此行的主要目的: 拟邀笔者为 2003 年哈佛燕京图书馆 75 周年纪念撰写一部《裘开明先生传记》。裘开明先生是笔者敬慕不已的图书馆学大师, 从事有关裘开明先生的研究是笔者心仪已久的计划, 而郑炯文先生又是笔者多年的老朋友, 因此, 笔者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光荣的研究任务。

其后, 笔者曾先后于 2001 年 10 月至 2002 年 1 月和 2002 年 10 月两次到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收集相关研究资料。随着研究的深入, 原来的研究计划也在不断地扩展, 最后确定编撰三部有关裘开明先生的著述:《裘开明图书馆学论文选集》、《裘开明先生年谱》和《裘开明先生评传》。这部《选集》正是这项研究计划的第一个阶段性成果。

裘开明先生既是 20 世纪欧美东亚图书馆事业的伟大先驱者, 又是学贯中西的图书馆学术大师。在图书分类学、编目学、目录学、版本学等诸多方

面,裘开明先生融中国的传统学术成就与西方的近现代学术精华于一炉,开创了既与中西图书馆学术迥异其趣,又与中西图书馆学术兼容并蓄的独特的“东亚图书馆学术”体系。这个学术体系几乎影响了整个20世纪西方东亚图书馆的发展,而东亚图书馆的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西方的亚洲研究。此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演绎了近一个世纪西方东亚图书馆事业与亚洲研究成长与发展的历史。

裘开明先生的著述不仅数量较多,而且涉及的学科领域亦广;其中有关图书馆学术方面的著述既有已经正式出版和发表的著作与论文,还有大量未刊的手稿和报告。在反复斟酌、三易其稿的基础上,这部《选集》仅收录了裘开明先生发表的图书馆学术论文与未刊稿38篇,其中:回忆录1篇、图书馆事业8篇、图书分类4篇、图书编目15篇、古籍研究7篇、哈佛燕京图书馆3篇。虽然这38篇图书馆学术论文只是裘开明先生全部图书馆学术著述的一小部分,但是,它们大致可以反映裘开明先生在图书馆学术研究领域的主要特点与成就。鉴于裘开明先生自编的“个人著述目录”(见“Reminiscence of a Librarian”)已经收录了裘开明先生正式出版和发表的主要著作和论文,为避免重复,《选集》的附录中没有收录笔者编写的《裘开明先生著述目录》,该目录将列入《裘开明先生评传》之中。

本着忠实原著、实事求是和方便阅读的原则,笔者在编辑的过程中对收录的论文做了如下编注技术处理:(1)将原文的文后参考文献(及注释)全部改为页下脚注;(2)将原文的文后中日韩文名词(人名、书名、地名、词语等)对照注释全部改为文中夹注,此类夹注均采用圆括号“( )”标明;(3)为方便不熟悉“威氏拼音”或英译中日韩文名词之类的读者阅读,笔者对原文中的部分英译中日韩文名词或拼音名词(人名、书名、地名、词语等)做了相应的中日韩文对照夹注,此类夹注均采用方括号“[ ]”标明;(4)将原文中的中文数字全部改为阿拉伯数字;(5)将原文中的所有中日韩文书刊名加注书名号“《 》”; (6)将原文中所有没有采用数字标明次序的章节均加注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以标明章节的次序;(7)将没有标点的中文论文全部加注标点;(8)因诸多因素的影响,原文中的插图(书影、照片)效果均不理想,故全部从略;(9)将原文中的个别笔误或排印错误的字词直接进行了更正;(10)将原文中没有表格的“图表”全部加注表格;(11)在每篇文章之后均注明文章的出处,必要时亦进行了相关注释。

在这部《选集》的编辑过程中,笔者曾得到了国内外诸多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竭诚帮助。

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先生自始至终对《选集》的编辑出版都提供

了全方位的鼓励、支持和帮助；哈佛大学哈佛学院图书馆南希·克莱恩副馆长(Nancy M. Cline, Roy E. Larsen Librarian of Harvard College)、哈佛燕京学社杜维明社长(Tu Weiming, Director o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爱德华·贝克副社长(Edward J. Baker, Associate Director o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一直关注和支持着《选集》的编辑出版；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沈津先生、朱宝樑先生、Ms. Jessica Eykholt、胡嘉阳女士、张凤女士、马小鹤先生、高青女士、哈佛燕京学社的薛龙先生(Ronald Suleski, Staff Assistant o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李若虹女士(Ruohong Li, Research Assistant o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等在笔者在哈佛大学收集资料时提供了大量的帮助；明尼苏达大学东亚图书馆陈肃馆长(Su Chen, Head of East Asian Library of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braries)在百忙之中热情地帮助笔者收集了明尼苏达大学的档案史料。他们的热诚支持与帮助令人终身难忘。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享誉全球的图书馆学家、93岁高寿的钱存训教授(Prof. Tsuen H. Tsien)不仅多次为笔者提供有关史料，而且欣然为《选集》惠赐大序；哈佛燕京图书馆前馆长吴文津先生(Eugene Wu, former Librarian of Harvard-Yenching Library)对笔者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十分宝贵的指导意见；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东亚图书馆前馆长汪燮先生(William Sheh Wong, former East Asian Librarian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在为笔者提供有关史料的同时欣然应允笔者将其研究裘开明先生的大作“Alfred K'aiming Ch'iu and Chinese American Librarianship”收录到本《选集》的附录之中。毫无疑问，这些图书馆学前辈们的大力支持为《选集》增添了光彩。

中山大学的同人邱蔚晴、王静芬、潘燕桃副教授、周志农副研究馆员、陈冰云、蔡筱青、梁丽萍、王煜，直接参与了本《选集》电子文本的录入、编排和校对工作。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十分重视《选集》的出版，不遗余力地支持《选集》的出版工作。

为此，笔者谨向上述为本《选集》提供过鼎力支持和热诚帮助的前辈、专家、学者、同人致以诚挚的感谢！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虽努力追求零错误，但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误，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程焕文

2003年4月30日

于广州中山大学竹帛斋

# 序言

钱存训

**裘**开明先生是美国东亚图书馆早期发展中的一位启蒙大师和领袖人物,也是最早以图书馆专业的资历全职主管美国东亚图书馆的第一人。他的主要贡献在以西方的图书馆管理方法结合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知识,处理美国图书馆中收藏的中日文资料,并辅导师生的教学和研究,成为这一专门领域的典型。而他所创建的哈佛燕京图书馆至今仍高居美国大学中收藏东方语文资料的首位,特别是中国文献的丰富,使之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宝库。

美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从 19 世纪末叶才开始,最初是仿效欧洲的学术传统,在一些大学中设立中国语文讲座,由通晓中文的传教士或中国和欧洲的学者担任讲授,在采购图书的同时也接受赠送或交换,以供参考。只是当时的收藏没有系统,没有专人管理,也没有适当的方法加以处置。一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由于学术团体的提倡和基金会的资助,培养了一批美国自己的青年汉学家,才开始有系统的教授有关中国语文、历史、哲学、宗教、美术和其他方面的学科,并正式设立图书馆,收集有关资料,以辅助教学和研究。1928 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并创设哈佛燕京图书馆,在裘开明先生主持下,才开始有专人以中西结合的方法,使内容和形式完全不同的资料得以纳入西方图书馆的系统。

裘先生的博士专业是农业经济,而他的成就却在图书馆事业。他的贡献主要表面在三个方面:(一)珍贵图书的采访。哈佛燕京以雄厚的财力和专业人才的结合,在两次世界大战的中间,全力搜购,充实馆藏。因为当时

中国政局混乱、通货膨胀、书价低廉、私家藏书充斥市场,同时又有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就近协助,因此裘先生在各种有利的条件下,得以大批采购古籍善本和各类新书,使得他的采访工作获得最大的成功,不仅四部要典齐备,珍罕秘籍,尤多人间瑰宝。(二)图书分类法的编制。当时传统的四库不能容纳新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科技书刊,而西方的图书分类法又无法纳入中国和日本的传统古籍。裘先生针对当时哈佛藏书的内容,结合中国和西方图书分类法的原则,编制全新的《汉和图书分类法》以适应这一需要。分类大纲大致按照西方对知识分类的逻辑,但并不仿效杜威或国会的方法,而自成体系。全部内容共分为九大类,以中国传统的经部居首。每类之下,中西新旧兼顾,中国古籍则按照四库书目插入各类之中。编号采用四位数字,地位宽裕,简单而适当,成为当时西方图书馆对东亚语文图书普遍采用的一种分类法。(三)复印和汇编卡片目录。以卡片代替中国传统的书本目录,著录和西文图书相同的项目,加注罗马字拼音,按字母顺序排列,因此可以纳入西方图书馆的系统。卡片最初采用胶质复印,节省抄写人力,发挥卡片目录的功能。稍后又以卡片形式编印书本目录,减轻排版费用,成为后来其他图书馆以卡片复印大型书本目录的模范。

我在1947年应芝加哥大学的邀请,为其远东图书馆自1936年以来所购藏的中文古籍约10万册加以整理编目。当时我就决定采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分类法和印成的卡片目录,并得到裘先生的协助和指导,因此能在10年内,完成了全部的编目工作。我自1962年起兼任图书馆学研究院教授的职务,主管远东图书馆的教研部门。1969年,因专业人才的需要,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在芝加哥大学举办六个星期的远东图书馆学暑期讲习班,特别邀请裘先生担任《中文图书系统》一课的教学,并请他编制一份讲义,包括采访、分类、编目和排检等系列的专门作业。他那时已是71岁高龄,特地从香港赶来授课,受到参加同学的欢迎,也使讲习班的声誉得到提高,对此我感到特别荣幸。这是我和裘先生最后一次的相聚,对他的学识、经验和为人处事的诚实而谦虚的作风,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令人怀念而钦佩。

裘先生的著述丰富,他的写作大部分与其主管的业务有关,其中包括:中文图书的分类和编目法、善本古籍的叙录和题跋、管理的经验和馆务报

告、一般图书馆的论说、以及有关农业经济等撰述。这部选集所收的论文，大致为其有关图书及图书馆学的论著。读者不仅可从中获得图书处理技术方面的指导，同时也可领略到前辈经营管理的实际经验。

本集的编者程焕文教授是图书馆学的专家，著述丰富，有多年的管理及教研经验，并多次访问美国及参与和领导国内外许多图书馆和学术团体的专业活动，同时也是继承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传统的出色人才，作为裘先生选集的编者，是十分适当的人选。今年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成立 75 周年，郑炯文馆长特别编印一系列的专刊，不仅对该馆的创始人予以表彰，也为现居领导地位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提供永久纪念。作为美国东亚图书馆的从业人员和裘先生的旧友，爰略述所见，表示对裘博士的衷心怀念与景仰，并祝贺哈佛燕京图书馆过去的成就和今后的发展。

2003 年 3 月 30 日芝加哥

钱存训博士，图书馆学家、中国图书史学家、目录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1910 年诞辰于江苏泰县，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东亚语文与文化系统教授、远东图书馆学研究所所长，美国亚洲研究会东亚图书馆委员会主席等职；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荣誉馆长、东亚语文与文化系荣誉教授，英国李约瑟东亚科技史研究所研究员。

# 跨越时空的图书馆精神

——“三位一体”与“三维一体”的

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

程焕文

裘开明先生是 20 世纪西方最伟大的东亚图书馆先驱和华美图书馆学家(Chinese American Library Scientist)。因为我将会在即将撰写的《裘开明先生评传》中全面地描述裘开明先生的生平事迹,阐述裘开明先生的图书馆学术思想,总结裘开明先生对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东亚图书馆事业、乃至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卓越贡献,并客观地评价裘开明先生的历史地位及其对西方汉学研究的深远影响。所以,我今天不准备详细地阐述裘开明先生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我要与各位分享的是裘开明先生的图书馆精神。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不仅是因为精神既是永恒的,又是最宝贵的财富;而且还是因为精神既是最令人感动的实在,也是最能够催人奋进的力量。下面,我将从“三位一体”、“三维一体”和“跨越时空”这三个方面来阐述裘开明先生的图书馆精神。

## 一、“三位一体”

——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的历史遇合

哈佛燕京图书馆创始于位于哈佛大学图书馆总馆——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的“汉文文库”(Chinese Collection, 又称“汉文图书馆”或“中文图书馆”), 发展于位于博伊尔斯顿楼(Boylston Hall)的“汉和文库”(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和“汉和图书馆”(Chinese-Japanese Library), 兴盛于位于神学路(Divinity Avenue)的“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每当我走到哈佛燕京前面看到路标上“神学”(Divinity)这个单词的时候,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联想到“Trinity”(三位一体)这个单词,有时甚至将二者混为一谈。在基督教教义中“三位一体”指的是圣父、圣子、

圣灵三位一体。我不信教,但是我总有一种感觉:今天哈佛燕京图书馆坐落在神学路会不会是某种因缘的结果?我不想就此做一些“唯心主义”的求证,但是,我不得不说明的是:在许多方面,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的确是“三位一体”的。也许,并非每一位在座的专家学者都很熟悉太平洋彼岸的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他们怎么会与太平洋此岸的裘开明先生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呢?

韦棣华女士(Miss Mary Elizabeth Wood, 1864—1931), 1861年8月22日诞生于美国纽约州巴达维亚(Batavia)附近的一个名叫埃尔巴(Elba)的小镇。1889年,韦棣华女士走出家门,开始从事社会工作,担任纽约州巴达维亚“理奇蒙特纪念图书馆”(the Richmond Memorial Library, Batavia, New York)的第一任馆长;1899年,由于义和团运动,韦棣华女士只身赴中国武昌探望其幼弟韦德生(Robert Wood)牧师,后因怜惜武汉民众的疾苦和教育条件的不足,遂决定留在中国,并立志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提高民众的智识。她于1910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真正具有现代公共图书馆意义的图书馆——文华公书林(Boone Library, 请注意“公书林”这个特别名词的独特意味);1920年与沈祖荣先生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Boone Library School, 以下简称“文华图专”);1924年促成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用于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并因此于1925年发起并促成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1927年代表中华图书馆协会在英国图书馆协会50周年纪念大会上与其他14个国家的代表共同发起成立了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IFLA)……;1931年5月1日因病在武昌逝世。作为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开山鼻祖,韦棣华女士曾被民国第二任总统黎元洪将军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the Queen of the Modern Library Movement in China)。<sup>①</sup>

沈祖荣先生(Samuel T. Y. Seng, 1884—1977), 1884年诞生于湖北省宜

① Samuel T. Y. Seng, Miss Mary Elizabeth Wood; The Queen of the Modern Library Movement in China. 文华图书季刊(英文之部). 1931, 3(3): 8—13

Cheng Huanwen. Miss Mary Elizabeth Wood; from an American Librarian to the Queen of the Modern Library Movement in China. 见: 澳门图书馆暨资讯管理协会编. 两岸三地图书馆管理与技术. 澳门图书馆暨资讯管理协会出版. 2001, 1: 85—101

昌市,少年时由于家境贫寒一直无缘读书,1903年获湖北宜昌圣公会教堂推荐,只身到武昌圣公会所办的教会学校——文华书院(Boone College,1916年组升为文华大学,Boone University)免费求学;1910年文华大学毕业后,因深受韦棣华女士精神的影响,毅然决定放弃一切升官发财的机会,投身于韦棣华女士创办的文华公书林,担任协理(副馆长),致力于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1914年受韦棣华女士的资助赴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School)留学,开创了我国赴美攻读图书馆学的先导;1917年学成回国后发起了席卷全国的新图书馆运动;1920年与韦棣华女士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并担任文华公书林总理(馆长)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校长达30余年;1925年参与发起中华图书馆协会,并长期担任主要职务;1929年作为中国的惟一代表参加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第一次大会,揭开了中国图书馆人参与国际图书馆活动的序幕;1941年在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创办档案管理科,开创了我国档案学教育的先河……;1977年2月于江西省庐山逝世。沈祖棻先生培养的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占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图书馆专业人才之大半,且遍及海内外,被海内外共誉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the Father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sup>①</sup>

裘开明先生(Alfred K'aiming Ch'iu,1898—1977),1898年生于浙江镇海县,1912年(?)就读于湖南长沙的美国圣公会学校——St. James Middle School(湘雅中学?);1915年被美国圣公会推荐免费攻读文华中学,1918年又被推荐免费攻读文华大学;1920年因深受韦棣华女士精神的感动在文华图书科创办时改修图书馆学,1922年毕业,成为中国第一届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仅3人);1922年文华图书科毕业后担任厦门大学图书馆第一任馆长;1924年受厦门大学的派遣赴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攻读图书馆学;1925年考入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the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经济系攻读经济学(同时继续完成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的一年实习课程),并于1927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33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担任哈佛大学图书馆汉和文库主管(the Custodian of the Chinese-Japanese

① 程焕文.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棻评传.台北:学生书局,1997年8月

Collection); 自 1931 年起一直担任美国第一个东亚图书馆(请注意 Collection 与 Library 之间的差别,以及 Custodian, Curator 和 Librarian 之间的差别)——哈佛大学图书馆汉和图书馆馆长(the Librarian of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1965 年担任了 38 年馆长的他退休后应邀赴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图书馆创办其东亚图书馆; 1966 年又应邀赴香港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首任馆长……; 1977 年 11 月于剑桥逝世, 被誉为“美国东亚图书馆馆长之领袖”(the Dean of the East Asian Libra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sup>①</sup>

我之所以说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是“三位一体”的, 是因为他们三位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密不可分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佐证:

其一, 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三位具有一脉相承的师承关系。

早在 1903 年沈祖荣先生就读文华书院时, 韦棣华女士就是沈祖荣先生的英文老师。自 1910 年起, 沈祖荣先生开始追随韦棣华女士左右从事图书馆事业。从早期的师徒式图书馆学教育模式来看, 沈祖荣先生可以算做是韦棣华女士的开门弟子。重要的是, 他们的这种师生关系具有与通常的师生关系迥然不同的意义: 一方面, 韦棣华女士不仅是沈祖荣先生的图书馆学启蒙老师, 而且还一直是沈祖荣先生从事图书馆事业和研究图书馆学术的导师; 另一方面, 沈祖荣先生既是韦棣华女士的学生, 又是韦棣华女士的最忠实的事业继承人, 还是韦棣华女士最信赖的朋友。

裘开明先生是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于 1920 年在武昌昙华林正式开始设坛教学的开门弟子。作为“文华图专”的第一届毕业生和“文华图专”

① Alfred K'aiming Ch'iu. Reminiscence of a Librari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5 (1964—1965): 7—18

A. K'aiming Ch'iu, 1898—1977. HUL Notes—News & Notes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y. No. 447, 24 November 1977

Eugene W. Wu. A. K'aiming Ch'iu and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Se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Archives; File: A. K'aiming Ch'iu and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Eugene W. Wu. The Founding of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Bulletin. No. 101 (December 1993): 65—69

第一个最忠诚图书馆事业的杰出代表,裘开明先生与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的这种师承关系同样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师承关系,而是一种决定人生和理想的师承关系。所以,在研究裘开明先生的过程中,我们不可以忽视这种师承关系的影响力。

如果没有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的图书馆学启蒙教育和精神感召,我们就无法想像裘开明先生投身于图书馆事业的人生抉择。

1922年裘开明先生在“文华图专”毕业后其第一个图书馆工作职位——厦门大学图书馆馆长是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推荐的。裘开明先生虽然在厦门大学图书馆只做了两年多的馆长就来到了美国,但是,裘开明先生对这份荣誉一直十分珍惜,他在他后来的论著中经常并列题写“原厦门大学图书馆馆长”和“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馆长”两个职务,这本身就是很好的说明。

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人赴美攻读图书馆学之风渐盛,而尤以赴著名大学者为多,为什么裘开明先生要选择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除了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的推荐以外,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沈祖荣先生的影响。可以说,裘开明先生是沿着沈祖荣先生十年前赴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攻读图书馆学之路而来到美国的。这的确是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事。

沈祖荣先生在“文华图专”一直讲授的课程是“图书分类法”和“图书编目法”,这些课程对裘开明先生影响深远。我们只要看一看裘开明先生的三部具有广泛影响的力作——《中国图书编目法》(1931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汉籍分类目录》(1938—1940年)和《汉和图书分类法》(1943年),就不难看出这种影响的深远性。

裘开明先生对他的老师一直十分尊崇。在1931年韦棣华女士逝世时,他专门撰写了《韦师棣华女士传略》一文以纪念韦棣华女士,30年后他又专门为 *Notable American Women (1607—1950)* 撰写了“Mary Elizabeth Wood”的千言条目,其对韦棣华女士的崇敬之情跃然纸上。在20世纪30年代,裘开明先生曾先后两次回中国,虽然其主要目的是赴河北省做农村调查和在北京哈佛燕京学社及燕京大学图书馆校勘自己的著作,但是,他每次都不远千里专程到武昌“文华图专”去拜访他的老师沈祖荣先生。那时,裘开

明先生已经是在海内外国内具有相当影响的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馆长,但是,《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上的报道一直称裘开明先生为“裘开明同学”,那种师生的情谊同样是跃然纸上,充满了温馨。

其二,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三位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

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三位均信仰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Christian)。如果仅从基督教信徒这种共性上来讲,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因为在美国和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的中国,信仰基督教的人的确是太多和太普通了。但是,当这种宗教的精神发挥到图书馆事业之中并产生共同的图书馆精神的时候,当这种共同的信仰作用到人生之中并导致共同的人生道路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共同信仰问题。

韦棣华女士赴中国之前只是一个普通的基督教信徒,但是她到了武昌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文华大学以后,由于在图书馆事业方面的突出贡献,或者也可以说她所做的一切因应了基督教“服务大众”的理念,后来武昌美国圣公会曾授予韦棣华女士“世俗传教士”(Lay Missionary)的称号。(因为关于韦棣华女士的图书馆精神我另有专著论述,所以这里不赘述)

沈祖荣先生 17 岁时才开始读书,如果没有武昌美国圣公会提供的读书机会,沈祖荣先生后来恐怕也不会成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先生信仰基督教,并将基督教之精神发挥到图书馆事业之中,以“智慧与服务”作为“文华图专”的校训,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智慧与服务”精神且享誉海内外的图书馆人才。但是,不幸的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他只能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完全埋藏在心里。

裘开明先生由于从湖南长沙湘雅中学到湖北武昌文华大学一直读的是教会学校,所以,他信仰基督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不是受到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的“智慧与服务”之精神的影响,那么,我们很难想像他在文华大学三年级时为什么会改选当时没有几个学生愿意学的冷门——图书馆学专业。在座的各位专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两个问题:为什么裘开明先生在 1925 年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毕业以